

主编 余伟民

俄罗斯道路：历史与现实

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

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 编

上海三联书店

俄罗斯道路：历史与现实

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

主编 余伟民

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 编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道路:历史与现实——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
余伟民主编;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编. —上海:上海三
联书店,2013.5

ISBN 978-7-5426-4110-6

I. ①俄… II. ①余…②中… III. ①俄罗斯—现代
史—文集 IV. ①K51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9356 号

俄罗斯道路:历史与现实——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

编 写 / 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

主 编 / 余伟民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

版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480 千字

印 张 / 27.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110-6/C·463

定 价 / 58.00 元

“俄国(苏联)史”作为一种主体性叙事,在苏联历史的建构中曾长期受制于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即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代表的苏联官方历史叙事。斯大林逝世后,这种历史叙事曾有过一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以及在一些曾被斯大林遮蔽的历史细节的补充上,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叙事模式。苏联时期的“俄国(苏联)史”即使以学者个人名义发表,也不过是官方著述的翻版,大多为教科书的风格,几乎没有独到的个人观点。苏联的官方历史著述也影响了中国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俄国(苏联)史研究,1950—1960年代,中国出版的俄国(苏联)史著作大多为苏联著作的翻译本,当时中国的苏联史研究尚处在单方面引进阶段,还没有独创的研究成果。

在苏联官方历史著述之外,1950年代后,随着对斯大林的批判和思想文化领域一定程度的“解冻”,苏联知识分子中逐渐形成了“持不同政见者”阶层,他们对俄国(苏联)历史的不同见解成为遭官方禁止的另类历史叙事。这些著述中的一部分后来在西方发表,有些作者也流亡到西方国家。其中较有影响的如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阿夫托尔汗诺夫的《党治制的由来》等。持不同政见者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苏联历史进行批判性的叙述,他们的研究利用了一些被官方掩盖但当事人仍可获得的资料,揭示了苏联历史的另一面。这种历史叙事也在东欧国家出现,体现了东欧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控制的改革思潮。由于批判斯大林的需要,类似的展示“历史真相”的资料也一定程度上被用在官方著述中,如赫鲁晓夫时期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都有一些此类内容,但被限制在既定不变的“结论”中。上述对俄国(苏联)史的另一向度叙事也被运用于中苏关系分裂后中国对“苏联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及沙俄侵华史的批判性著述中,到1980年代则被运用于论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因此,1970—1980年代,中国曾以“内部发行”的方

式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东欧持不同政见者撰写的俄国(苏联)史著作。1980年代后,中国学者以自己的立场和视角撰写的俄国(苏联)史著作也开始出现。

1991年苏联解体后,苏联史研究展开新的格局。作为后苏联的俄罗斯,近二十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其中包括国家体制和国家意识的重构。由于转型期的复杂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此期间对俄国(苏联)历史的认识也表现得多元和不确定。大致而言,叶利钦时期承袭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公开性”思维,对苏联史的看法以批判为主,力图通过否定苏联而将“新俄罗斯”与十月革命前的“旧俄罗斯”联结起来,为后苏联的国家体制提供历史的正统性。普京执政后,随着国家主义的强化,对苏联历史地位的看法有所改变,一方面继续批判斯大林模式的专制“罪行”,另一方面又大力肯定斯大林时期的强国主义“贡献”。这种来自官方的二元论苏联史观也反映在在近十年编著出版的俄国(苏联)史著作中(此期间出版的苏联史著作大多以《20世纪俄国史》或《俄罗斯现代史》为书名,鲜见专门的《苏联史》)。最近有几部引起中国学者关注的作品大体上反映了俄罗斯学界在苏联史方面的不同观点及其立场取向。菲利波夫主编的《俄罗斯现代史》(2007年版)被认为是肯定斯大林强国主义的代表作。祖博夫主编的《20世纪俄国史》(2009年版)则被认为是批判苏联历史的最激进的作品。在此两端之间,大量新近出版的相关著作持相对中间的立场,但同样可见二元论苏联观的影响,这类著作的代表如萨哈罗夫主编《俄国史》之分卷《20世纪俄国史》(2001年版)等。可以预见,尚处于转型期的俄罗斯,由于其发展方向的不够确定和领导人执政理念的波动,对俄国(苏联)历史的基本看法还将较长时期处在多元并存、缺乏共识的状态,并将持续影响学界的研究和历史著述。其实,这种学术生态恰恰表明后苏联的俄罗斯已经告别了苏联时期官方意识形态垄断学术的局面,给学者们提供了自由研究和讨论的空间。而这种自由的学术生态也给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带来了有利于创新的学术资源和开放的讨论空间。

中国学者独立的俄国(苏联)史研究起步于1980年代,鲜明地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三十年来,中国的俄国(苏联)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80—1990年代,一批曾留学苏联或长期从事苏联史教学的老一代学者开创了俄国(苏联)史研究的新局面,贡献了奠基性的研究成果,包括第一批独立撰写的俄国(苏联)通史著作和专题性研究著作(经济史、文化史、人物传记等),其中多数作品都吸取了国际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如新经济政策研究、斯大林模式研究、托洛茨基研究、布哈林研究、二战前及战时苏联对外政策研究等。1990年代中

期以后,随着解密的苏联档案文献引进翻译和中青年学者的成长,俄国(苏联)史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史料发掘的最重要成果是沈志华执行总主编、几十位学者参与翻译编辑的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基于档案文献的发掘整理,近十年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了从档案史料出发重构历史叙事的特点,其中最新的代表作为二十余位作者合力撰写的实证性苏联史专题研究《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2009年版)。此阶段,从理论上对俄国(苏联)历史的探讨也有不少成果问世,表达了中国学者对俄国(苏联)史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尽管对苏联历史地位的评价目前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总体上随着苏联解体后大批档案文献的解密,苏联历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由此带动俄国史整体研究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俄国(苏联)史研究领域的新进展除正式发表的著作和论文,还表现在相当数量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中。

本书是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会员2005年以来部分研究论文的选编,涉及古代、近代、现当代诸时段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诸领域。文集的作者均为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中青年学者占了相当比重,他们是目前中国学界研究俄国(苏联)史的中坚力量。文集中的论文大多已在各专业学术刊物发表,部分论文选自2010年在上海举行的研究会学术年会。这些论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学者在俄国(苏联)史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和取得的新进展。出于编辑需要,编者对部分论文的标题和文字做了一些调整、修订和删节。本书的编选得到全体会员的热情支持,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限于篇幅和文集主题,还有一些提交的论文未能编入,谨向作者致以歉意。

编者

2012年5月

前言	1
----	---

上编 俄国史(1917年十月革命前)

曹维安:俄国史学界关于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争论	3
罗爱林:俄国农村公社名称探析	23
姚海:战争对俄国发展道路的影响	36
解国良:从土地关系的演变重新解读俄国农民问题	52
张广翔: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农业发展道路之争	65
国春雷:蒙古入侵期间罗斯东正教会拒绝与天主教会合并的原因	82
张来仪:伊斯兰质素对俄罗斯语言文学的影响	92
金雁: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经费”问题的争论	100

中编 苏俄—苏联史(1917—1991)

郑异凡:自由:十月革命的第四个口号	117
余伟民:十月革命与20世纪	
——关于俄国十月革命世界历史意义的再思考	125
邵丽英:十月革命与民主	
——苏联政治制度起源的再思考	132
马龙闪:新经济政策夭折原因新论	
——侧重社会史视角的论析	139
张丹:1920—1930年代苏联的住房建设合作社	158

李 燕:试析苏联 1932—1933 年饥荒发生的原因	173
周尚文:苏共执政时期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教训	183
戴隆斌: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及对苏联剧变的影响	201
黄立蓓:谁搞垮了苏联?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利益集团”与苏联剧变	214
郭春生、陈婉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 ——剖析知识分子抛弃苏联的历史原因	228
左凤荣:第比利斯事件的前因后果	241
王晓菊:俄罗斯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	250
彭传勇:苏联与 1920—1930 年代外蒙古的政治走向	261
王桂香:贝利亚与 1953 年 6 月东德危机	275
刘显忠:中东路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87
张盛发:中长铁路归还中国的历史考察	309

下编 当代俄罗斯(1991 年以来)

田春生:关于俄罗斯制度移植的评析	347
刘军梅:俄罗斯经济的竞争力、发展困境及其出路	361
戴桂菊: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俄罗斯政教关系的新进展	378
张建华:从文化史到文化学:文明史观的复兴抑或重建? ——对俄罗斯学术热点现象的评析	388
国玉奇:当代俄国历史研究的多维化	407
闻 一:俄罗斯:历史在重新评说中蹒跚	423

上 编

俄国史(1917 年十月革命前)

俄国史学界关于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争论

曹维安

古罗斯国家的起源问题在 11—12 世纪即引起了编年史家的注意,俄国最早的编年史《往年纪事》开篇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罗斯国家渊源于何处?基辅的第一位王公是谁?罗斯国家又是怎样诞生的?”^①由涅斯托尔提出的这些问题一直到今天还使研究者们困惑不安。历史学家对问题争论的焦点是,瓦良格人、罗斯人是谁?他们来自何方?这一争论从二百五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直到现在还在继续。

一、诺曼说的产生与沙皇俄国时期关于瓦良格问题的争论

从 18 世纪 30 年代起,先后在彼得堡科学院供职的德国史学家 Г. З. 巴耶尔(1694—1738 年)、Г. Ф. 米勒尔(1705—1783 年)、А. Л. 施廖采尔(1735—1809 年)等人,以编年史《往年纪事》为基础,通过对古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考证,认为瓦良格人即诺曼人是古罗斯国家的建立者,从而形成了古罗斯国家起源的理论——诺曼说。这样,瓦良格人从何而来的问题(即瓦良格问题)遂成为古罗斯国家起源的核心问题。从此,后人就把巴耶尔看作是诺曼说的创始人。

巴耶尔 1735 年的拉丁文论文《论瓦良格人》首次提出了编年史中所提及的瓦良格人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观点,米勒尔 1749 年的拉丁文讲演稿《论俄罗斯族及其名称起源》是对巴耶尔观点的进一步补充和说明,施廖采尔在 1800~1809 年出版的五卷本德文著作《涅斯托尔》则是对诺曼说的系统论述。^② 他们的

① 王钺:《往年纪事译注》,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 页。

② 参见曹维安:《诺曼说新探与诺曼学派》,《世界历史》1998 年第 1 期,第 105—108 页。

主要论据是:

第一,依据古罗斯编年史《往年纪事》,瓦良格人住在“海外”,因此他们是瑞典人;^①

第二,根据9世纪一部西方拉丁文本《别尔京编年史》的记载,839年有几个“罗斯人”与拜占庭使节一起前往觐见法兰克帝国皇帝路易,按照“这几个罗斯人”自己的说法,他们是瑞典人;^②

第三,在伊戈尔大公与拜占庭帝国945年签订的和约中所列“罗斯”使节和商人的名字中,有许多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名;^③

第四,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君士坦丁·巴格里亚诺德内,905—959年)在其著作《帝国行政论》(写于945年)中记载第聂伯河险滩的名称时,既列出了斯拉夫名称,同时还列出了“罗斯”名称,这些险滩的“罗斯”名称多具有斯堪的纳维亚语起源;^④

第五,从词源学角度看,“罗斯”(Русь)名称源于瑞典东部省名 Roslagen 一词。

应该说,这些论据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直到现在还是证明诺曼说的主要依据。巴耶尔和米勒尔提出的关于考证史料的原则,关于罗斯与斯堪的纳维亚和拜占庭具有紧密联系,以及古罗斯国家起源的基本理论,对俄国和国外学者研究俄国早期历史的观点发挥了长期影响,也大大促进了18世纪下半期—19世纪上半期俄国历史学的发展。

针对米勒尔1749年讲演稿所表达的诺曼说,俄国科学家M. B. 罗蒙诺索夫(1711—1765年)奋起反对。他认为诺曼说含有敌视俄罗斯的政治倾向,并且没有科学说服力,因为在斯堪的纳维亚既找不到“罗斯”这一名称,也不存在关于邀请留里克为王的史料。罗蒙诺索夫并不否认编年史记述的可信性,但认为“瓦良格人”应该包括哥特人、立陶宛人、哈扎尔人和其他许多民族,而不仅仅是瑞典

① 王钺:《往年纪事译注》,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他们到海外瓦良格人、罗斯人那里去了。”

②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в свете зарубежн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Под ред. Е. А. Мельниковой. М.: «Логос», 2003, С. 288—289.

③ 王钺:《往年纪事译注》,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96—99页。瓦·奥·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2页。

④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в свете зарубежн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Под ред. Е. А. Мельниковой. М.: «Логос», 2003, С. 97—98. 参见王钺:《往年纪事译注》,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4页。

人。此后,罗蒙诺索夫便被认为是反诺曼说的奠基人。

从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诺曼说在俄国官方历史学中成为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基本观点。H. M. 卡拉姆津(1766—1826年)及其同时代的许多历史学家都持诺曼说,历史学家C. M. 索洛维约夫(1820—1879年)在认为邀请瓦良格王公的传说是基本事实的同时,不认为这个传说对俄罗斯民族自尊心有什么冒犯之处。

到19世纪30—50年代,诺曼说与反诺曼说的斗争也成为俄国西方派与斯拉夫派斗争的一部分。这一斗争在19世纪60年代显得特别激烈,因为1862年正值俄罗斯的千年庆典年。历史学家H. H. 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年)、Д. А. 伊洛瓦伊斯基(1832—1920年)、俄国艾尔米塔斯博物馆馆长C. A. 格杰奥诺夫(1816—1878年)等人都是诺曼说的反对者。他们注意到邀请瓦良格人的传说首次形成为理论正是在“比隆时代”(1730—1740年),当时许多德国贵族在宫廷里占据高位,这些德国人竭力论证西欧对落后的俄罗斯的文化传播作用。此后,科斯托马罗夫还与M. П. 波戈金(1800—1875年)在彼得堡大学进行了一场公开论战。波戈金在政治观念上虽属保守的斯拉夫派,但在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上却持诺曼说观点。

历史学家Д. А. 伊洛瓦伊斯基与B. O. 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年)之间也形成了同样的对立。伊洛瓦伊斯基认为邀请瓦良格王公的传说完全歪曲了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生活面貌,他推定罗斯人是定居在第聂伯河基辅周围的斯拉夫人和罗克索兰人。克柳切夫斯基则认为瓦良格人源于诺曼人比源于斯拉夫人更有说服力,邀请瓦良格王公传说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征服:“如果揭去裹着这个传说的田园诗般的帷幕,那么我们就看到在那个时代不止一次地重复着的、非常普通的,甚至有点粗暴的现象……雇佣兵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就变成了统治者,而雇佣的工资也增加了,变成了义务的贡税。大概这就是隐藏在关于海外王公应邀到来的经过夸饰的传说中的简单实在的事实:自由的诺夫哥罗德区变成了瓦良格公国。”^①克柳切夫斯基还把罗斯名称与瓦良格—罗斯人联系在一起。^②

俄国的反诺曼派学者先后提出了瓦良格人来源的十几种观点:本土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芬兰人、立陶宛人、马扎尔人、哈扎尔人、哥特人、格鲁吉亚人、伊

①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6—137页。

② 同上书,第164页。

朗人、凯尔特人、犹太人等等。^①其中,C. A. 格杰奥诺夫 1876 年出版的《瓦良格人与罗斯》一书最为著名。作者写道:“如果瓦良格—罗斯人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诺曼起源就应该在罗斯历史中反映出来,就像拉丁—日耳曼起源在法国历史中、日耳曼—诺曼起源在英国历史中一样……诺曼因素应当在罗斯生活中,在其宗教、语言、法律、民族习俗中有所反映……而罗斯诺曼起源理论的历史认识不能满足这些条件”。^②格杰奥诺夫提出的这些问题直接指向了诺曼说的软弱方面,给诺曼说的整个理论体系以重大打击。格杰奥诺夫试图证明瓦良格人与波罗的海南岸的西斯拉夫人是一回事。

不过,俄国反诺曼派学者的观点过于分散,他们各自提出的论据也多显得软弱无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反诺曼派实际上既没有提出古罗斯国家建立的新观念,也没有引入研究的新方法和新史料来与诺曼派相对抗,他们只是力图在逻辑上反驳诺曼派的基本原则,集中注意瓦良格人和留里克的族属问题,其史料基础仍是书面资料,研究方法依然是从语言学出发,这一时期的反诺曼说更多是依靠斯拉夫主义的情绪来支持。

格杰奥诺夫的批判和实证主义方法的传播对诺曼说的进一步发展以强烈刺激。从 19 世纪下半期到 20 世纪初,一些新的史料尤其是东方阿拉伯史料被陆续公布,从而扩大了对问题研究的史料基础。例如,俄国东方学家 X. Д. 弗伦(1782—1851 年)公布的东方史料,内容涉及古罗斯及其近邻哈扎尔人和伏尔加河的保加尔人。东方学家 Д. А. 赫沃尔松(1819—1911 年)公布了阿拉伯哲学家伊本·鲁斯特(1126—1198 年)的资料,还有俄国学者出版了有关古罗斯的阿拉伯资料汇编。这些史料被诺曼派学者用来当作对付格杰奥诺夫的论据,但反诺曼派学者也提到了另外一些阿拉伯史料作为反击。问题是有关古罗斯的阿拉伯史料的作者多是通过转述、改编而获得的二手信息,通常并不直接了解东欧,这就给研究者论证不同的说法都提供了很大的可能。

1891 年,丹麦语言学家、历史学家 B. 汤姆逊(1842—1927 年,1894 年起为彼得堡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的著作《罗斯国家的起源》的俄文版出版,^③标志着诺曼学派“语文学阶段”的完成。此书论述清晰,总结了此前诺曼说的全部语文学

① Мошин В. А. : *Варяго-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 转引自:Татьяна Джаксон: *Варяжский вопрос*, <http://janaberestova.narod.ru/jackson.htm>.

② Геденов С. А. : *Варяги и Русь*. М. :《Рус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2004, С. 66.

③ Томсен В. : *Начало Ру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 ,1891.

论据,并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史料分析,被认为是诺曼说的经典之作。

与此同时,俄国杰出的罗斯编年史校勘学家和文献学家 A. A. 沙赫玛托夫(1864—1920 年)关于俄国编年史《往年纪事》的研究对瓦良格问题的争论也做出了重大贡献。^① 不过,沙赫玛托夫论证的结论是,《往年纪事》中关于邀请瓦良格王公的传说是后加进去的。虽然如此,沙赫玛托夫还是认为这一传说是可信的,并倾向于承认瑞典人在古罗斯国家建立中的“决定性作用”。甚至古罗斯国家的名称“Русь”,他也认定为源于芬兰词“Ruotsi”,而这正是瑞典人的标志。

对问题的争论也在考古学领域进行。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考古学家已经在俄国北方地区,如弗拉基米尔古墓地、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格尼奥兹多沃古墓群、雅罗斯拉夫附近的米哈伊洛夫古墓地等,发掘出一系列具有斯堪的纳维亚特征的墓葬及其文物。特别是位于第聂伯河上游的格尼奥兹多沃古墓群,分布着大约 4500 座古墓冢。对格尼奥兹多沃古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从 1874 年开始,到 20 世纪末已发掘出七百多处墓穴。

在 20 世纪初俄国考古学家已经可以根据考古资料做出综合性的研究报告,以与文献资料相对照。但是,由于当时通过随葬品来确定民族归属的方法远不如今天完善,加之学者们对考古资料和文物的认识不尽相同,结果就出现了大相径庭的结论。1902 年,俄国考古学家 B. И. 西佐夫在亲自参加发掘工作后,发表了第一份关于格尼奥兹多沃古墓群的综合研究报告。他在承认格尼奥兹多沃古墓群的葬礼仪式中存在诺曼因素的同时,谨慎地认为诺曼人所占的份额不大:“尽管在格尼奥兹多沃古墓中找到的属于 9—10 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东西比在其他地方多,我们仍然应注意到,把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东西的数量与古墓发掘出的其他风格的东西相比,瓦良格因素在格尼奥兹多沃不占优势……”^② 著名俄国考古学家 A. A. 斯皮岑(1858—1931 年)在 1905 年则提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在格尼奥兹多沃存在“纯诺曼型古墓”,在罗斯历史上有“许多诺曼人”:“这些人是统治者,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是当时外来文化的辉煌

① Шахматов А. А. : Сказание о призвании варягов. СПб., 1904.

② Сизов В. И. : Курганы Смолен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Ч. 1: Гнёздовский могильник близ Смоленска // МАР. СПб.

№28. Смоленск и Гнёздов. 1991, М., С. 119. <http://www. archeologia. ru / Library/ Book / cfa0b70150cf>.

代表。诺曼人在克里维奇人的生活中引起了极大的变革。”^①为什么对同一古墓群的认识会有如此大的分歧?俄国学者 И. В. 库拉耶夫认为,根源在于如何确定斯基的纳维亚随葬品出现的方式:在西佐夫的报告中认为这些随葬品是从海外输入的东西,而在斯皮岑那里,这些随葬品只在直接的携带者斯基的纳维亚人那里流传。^②

1914 年瑞典著名考古学家 Т. 阿尔涅来到俄国,他从古罗斯墓地的整个墓葬方式中区分出专门的葬礼仪式(船葬、焚烧船只、毁坏武器等),并认为这些葬礼仪式具有瑞典中部古墓的部分特征。阿尔涅把格尼奥兹多沃的斯基的纳维亚人视作古罗斯领土上的常住居民,并强调他们职业上的贸易特点,如商人、武装侍从,这些人组成了罗斯社会的显贵阶层。他还得出了诺曼人在格尼奥兹多沃建立了海外商站(即殖民地)的结论。^③ 1914 年,阿尔涅的《瑞典与东方》一书出版,此书对诺曼说的发展起到了不亚于 B. 汤姆逊的《罗斯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作用。

这样,到 20 世纪初,在俄国官方学术界(科学院,一些大学和机构)就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诺曼说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甚至苏联建国初期的科学院院士、考古学家、历史学家 Ю. В. 戈季耶(1873—1943 年)1930 年在其《东欧的铁器时代》一书中也宣称,诺曼说与反诺曼说之间的争论已经在“有利于诺曼人一方而得以解决”。^④ (应注意的是,戈季耶在苏联时期被划归为“旧学派”,他的观点也被称为“革命前的观点”)

总体来看,从 18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初,尽管诺曼说在俄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但反诺曼说却更迎合了俄国社会舆论和普通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心态。诺曼派多为在俄国的外籍人,反诺曼派则多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人。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都对诺曼说持赞同态度,反诺曼派则少有职业历史学家。但不管是诺

① Спицын А. А. : Гнёздовские курганы в раскопках С. И. Сергеева // ИАК. СПб. Вып. 15. 1905. С. 7. 转引自: Авдусин Д. А. :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антинорманиз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88. №7. С. 26.

② Кураев И. В. :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варяжской вопроса (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 Гнёздова), Портал “Археология России”, 2005, С. 27. <http://www.archeologia.ru/Library/Book/cfa0b70150cf>.

③ Кураев И. В. :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варяжской вопроса (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 Гнёздова), Портал “Археология России”, 2005, С. 28. <http://www.archeologia.ru/Library/Book/cfa0b70150cf/page28>.

④ Готье Ю. В. : Железный век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М., 1930. С. 248. 转引自: Шаскольский И. П. : Антиномизм и его судьбы. // Проблем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Генезис и Развитие в России. Вып. 7. Л.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83. С. 37.

曼派还是反诺曼派,他们都只关心古罗斯国家“是谁”建立的问题,而没有提出古罗斯国家是“怎样”建立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他们都把留里克王朝的起源(瓦良格问题)与罗斯国家的起源视为同一个问题。

二、苏联史学界对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

苏联建国初期,在革命前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诺曼说对 М. Н. 波克罗夫斯基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有很大影响。波克罗夫斯基认为,“现代历史学家常常由于爱国的即民族主义的理由而驳斥这一传说(指‘邀请瓦良格人’——引者),他们觉得说最初的一些君主是外国人有损于俄罗斯斯拉夫人的民族自尊心。其实这比说俄国从 18 世纪后半期起是由德国霍斯敦公爵的后代用罗曼诺夫王朝名义统治着,并不见得更多或更少地有损于俄罗斯斯拉夫人的民族自尊心。”^①

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苏联史学界在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同时,也掀起了一场批判诺曼说的斗争。苏联学者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开始强调“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②认为古罗斯国家的建立是东斯拉夫人内部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研究古罗斯国家的历史学家 Б. Д. 格列科夫(1882—1953 年)、Б. А. 雷巴科夫(1908—2001 年)、М. Н. 季霍米洛夫(1893—1965 年)与考古学同行一起,竭力寻找 9 世纪初期到中期东斯拉夫人氏族公社制度瓦解的根据,因为这能够证明罗斯国家产生的内部前提。

在苏联史学界中,科学院院士 Б. Д. 格列科夫对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在研究东斯拉夫人生活的经济方面时,格列科夫论证了经历数世纪形成的罗斯国家的农业性质,并认为诺曼人仅仅是起到了次要作用。他写道,“我们……习惯于更多注意我国历史上这个时期沿大水路商业流通的豪华性增长,在那里占首位的总是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重东西。这种豪华常常妨碍研究者看到社会经济基础的真正实质。”^③(不同于 В. О. 克柳切夫斯基讲的“第聂伯河的、城市的、商业的罗斯”)不过,格列科夫并没有简单地贬低斯基的纳

①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78 年版,第 41 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167 页。

③ Греков Б. Д.: *Начальный период русского феодализма*. 《Вестник АН СССР》, 1933. №7. С. 17. 转引自:Авдусин Д. 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антиноманиз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88. №7. С. 27.